



“五个必须”： 新时代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 高惺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近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了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将之概括为“五个必须”，即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深化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

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硬道理。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基本前提。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上升不是线性的，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强调的是，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理解。从供给看，高质量发展应当具有一个体系和四个能力，即比较完备的产业体系，强大的创新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和需求捕捉力。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美好生活需求。从投入产出看，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

率、环境效率，并且不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从分配看，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并且充分反映各自按市场评价的贡献。从宏观经济循环看，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循环畅通。

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如果把现代经济运行比作是一艘“船”，那么供给和需求就是这艘船的“两支桨”。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供给和需求关系是现代经济运行中连接“微观与宏观”的桥梁，是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钥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供给和需求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不是割裂供给和需求。我国供给体系产能十分强大，在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全球的制造业大国，但大多数产品只能满足中低端的需求。随着我国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这样的低端产品已无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样的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的新变化，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关键一招。从历史上看，从来就没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改革是一项不间断的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同样是划时代的。当年碰到的问题是靠改革来解决的，今后碰到了问题，还得靠改革。所不同的是，发展到今天，改革中遇到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一

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藩篱日益显现，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要做到整体谋划。因为各领域的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的改革密切配合。

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必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有“两只手”，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形之手；另一只是看得见的政府有形之手。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这“两只手”之间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科学论断。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两个毫不动摇”是“定海神针”，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在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后，各类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国际环境继续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我国国家安全面临新的威胁和挑战，特别是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随着我们事业的不断前进和发展，新情况新问题越来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越来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越来越多。“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我们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保持头脑清醒，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各种潜在风险，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者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独立

自主是我国长期发展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所在，更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强调“独立自主”，但绝不意味着我国经济要与国际经济主动脱钩，而是要顺应国内外形势变化，从“国际循环带动国内循环”转变为“国内循环推动国际循环”，在更高水平上推进对外开放。实践也证明，大国经济如果没有独立自主作为保障，在关键领域过多依赖于其他国家，对外开放的战略就会受制于其他国家。

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更是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苦苦追求要实现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了实现现代化的艰辛探索。改革开放后，我国先后实现了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发展目标。进入新时代，我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最广大人民，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基础，经济不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靠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仍然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努力使发展达到一个新水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要坚定不移坚持。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



儒商的现代市场价值

□ 丰家雷



儒商，是伴随着儒学发展与商业经济发展逐步融合而形成的一个特有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把儒家思想融入企业经营，在商业经营的实践中践行“仁义礼智信”的社会伦理道德，是“儒”与“商”的有机统一，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十分璀璨的儒商文化。

经济发展归根结底要靠企业，企业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企业家。儒商既是一个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传承与发展的概念，更是一个紧密贴近时代、具有深刻时代烙印和现实意义的文化和经济符号。弘扬儒商精神、坚守儒商本分，对于弘扬企业家精神、增强企业文化自信、激发企业内生活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儒商精神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人文情怀”“诚信为本”“崇道尚义”就是其中的精华所在。儒家思想提倡义利统一、义以制利、见利思义、义重于利，义利之辨是儒商特质的一个重要体现。义与利同样是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不可回避的问题。市场经济中的企业遵循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如果没有约束就会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进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将儒家“义”的思想从道德领域引入经济领域，将其理解为社会公义，即社会利益、长远利益，每个经营主体的经济利益就成为社会利益的组成部分，短期利益应该服从于长远利益。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是统一的，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应遵循社会利益、长远利益优先的原则。现代企业家精神辩证地肯定了儒家义利观中的合理部分，科学地吸收其时代价值，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相适应，逐步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精神力量。当代儒商和儒商精神，必须体现在改革开放中，兼顾公私义利，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等关系和谐发展，做到人与我、利与义、效率与公平、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协调平衡各方利益，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利益，实现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双赢。通过创新发展、协调发展、民生福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根本利益。

企业的理念，因此企业家是否重视“义”是企业社会责任培育的关键。企业家应秉承义利统一、义利相生、义以为上的儒家义利思想，遵循社会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短期利益服从于长远利益的原则，尤其是头部企业不能疯狂收割个人利益。一方面增强社会责任感，以企业发展来“泽加于民”“兼善天下”，积极回报社会；另一方面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着眼长远利益的战略投资，将履行社会责任视为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把企业成长融入民族复兴、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征程。这也是儒商精神体现出的时代价值。

当今世界，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已成为发展的主旋律，儒商精神也会因时而变、变中求进。“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传统的儒商精神也会“老树发新枝”，为弘扬企业家精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文化血液和精神养料。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

□ 陈 龙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经济形势作出了科学判断，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当前，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优化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激发我国经济增长潜力，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充分认识我国经济取得的成绩以及经济运行的新变化新矛盾

今年以来，我国加强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着力扩大内需，优化结构，克服种种困难，成绩斐然，来之不易，国民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新动能体量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矛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在这些新变化新矛盾中，尤其要注意由于内需不足而引发的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相对不足不协调的趋势和矛盾。

一方面，我国经济质的提升取得了很大成效，与创新动能、高技术相关的产业发展较快。例如，今年1—10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1.1%，高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8.2个百分点；10月份，规模以上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规模以上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9.2%和53.2%。另一方面，其他一些产业以及民生相关的行业发展动力和活力不足，并且伴随着就业压力大、消费不振、地方财政困难以及相关领域部分企业经营难度大等问题。这些现象和问题，主要是由于需

求不足和量的增长不足引起的，从而出现了发展不均衡、产业经济冷热分化。

我们看到，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较大。完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的任务和目标，解决当前经济中的现实问题，需要高度警惕内需不足引发的量与质不协调趋势的演化，防止增长不足引发经济螺旋式收缩。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增长的速度问题，警惕增长不足现象，促使经济保持在合理增长水平。把握好发展的动态均衡到动态均衡的演进过程，先立后破，为产业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这对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成为当前我们经济工作的紧要任务。

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及基本要求

依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当前经济运行的新变化新矛盾，未来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增强经济活力，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需要把握好“适度加力”和“提质增效”两个基本要求。

“适度加力”，即财政政策力度要合适。力度太小，则影响财政政策的效果，对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支撑不够；力度太大，则超过经济合理增长

的需要和财政的承受能力，给经济发展和财政运行带来新的风险。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需要把握好两点。

其一，财政政策的力度要与增长的潜力和现实需要以及国民经济规模相匹配。确定经济增长目标和财政政策力度，通常以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为依据。过去三年我国遭受疫情严重冲击，这一时段的经济数据明显低于正常的历史趋势线。当前就业压力大，一方面体现出现在的增长水平是不充分的，另一方面意味着我国具有提升增速的人力资源空间。今年新增就业的目标任务是1200万人左右，2024年的压力只增不减，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1187万人，解决新增就业仍需提高经济增速。财政政策的力度，要与这一潜在增长水平相匹配，激发经济增长潜力。

其二，财政政策的力度与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虽然综合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发展潜力、债务资金使用、融资成本及流动性、财政承受及偿付能力、政府资产资源状况等分析，我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总体安全，可以为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供一定的空间，但在财政收入和兑付风险的情况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要在优化政策工具和方式上下功夫，减轻财政压力，防止引发新的风险。

“提质增效”，即用好财政政策空间，提升财政政策效率，以较小的政

策成本取得尽可能大的调控成效。为此，主要做好两个方面：一是优化财政政策的作用方向，用好财政政策空间，提升经济增长效率，增强中长期发展动能。围绕新质生产力和产业转型升级、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以及扩大需求、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等目标，选择合理的政策方向和方式。二是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通过优化组合政策工具，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财政支持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例如，随着大规模专项债的发行，地方优债项目不断减少，需要基于全国层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统筹协调，综合考虑融资成本、国家整体规划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要求，调整投资方式和政府债务结构，提升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和未来潜力。

下一阶段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

激发我国增长潜力，实现经济合理增长，需要维持合理充沛的总需求，加强投资动态管理，完善财政投融资方式和结构，优化政府债务结构，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改善社会预期，增强经济活力，以公共服务和广义基础设施建设为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着力点，消除制约消费需求的深层因素，以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其一，以进促稳，加强投资规划

和动态管理，维持合理充沛的总需求，支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一是立足于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着眼未来我国二三十年的发展，做好短期发展动能。围绕新质生产力和产业转型升级、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以及扩大需求、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等目标，选择合理的政策方向和方式。二是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通过优化组合政策工具，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财政支持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例如，随着大规模专项债的发行，地方优债项目不断减少，需要基于全国层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统筹协调，综合考虑融资成本、国家整体规划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要求，调整投资方式和政府债务结构，提升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和未来潜力。

其二，完善财政投融资的方式和结构，调整政府债务结构，减少财政压力，解决长期持续发展的预期和动力问题。在满足地方基建基本需求的条件下，建立以中央为主导的投资模式，增加中央重大基建项目，逐步动态降低地方投资占比。在广义财政投融资重大基建项目的资金来源上，予以有序分类安排，对于无现金流回报的公益类及国土治理、水利、农村污水处理及水循环等重大项目建设资金解决；对于有现金流回报但周期较长的重点基建投资项目（包括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部分电力、天然气、能源、水处理及供应项目和部分交通运输基建项目），其20%的项目资本金，由项目承接主体负责其中的10%，另外一半资本金由政策性银行等广义财政资金解决，财政资金给予贴息和增信支持；对于现金流回报充

沛的基建投资项目，鼓励开发和运营主体通过市场化方式筹措资金。这样既不会过度增加财政负担，又能解决长期持续发展的预期和动力问题。与优化基础设施投资结合起来，适度提升中央债务占比，控制地方债尤其是专项债的增量规模。

其三，综合施策，以公共服务和广义基础设施建设为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着力点，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在培育壮大新型消费、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的基础上，着力推动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尤其是公共服务和广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对于改善消费环境、解决消费堵点、带动个人的消费，具有重要作用。为此，通过增加公共服务保障性住房和广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解决好住房、养老、育儿、医疗等制约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同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保覆盖范围，逐步提升保障水平，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

其四，加强政策和工具配合，把握好政策调整节奏。根据宏观形势和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尤其是根据就业状况、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水平的差距以及总需求的变化，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灵活使用相关工具，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把握好政策调整节奏，在经济增长尚未达到潜在增长水平或内生动力尚未完全恢复之前，不应过早采取收缩性政策，避免打断经济恢复向好趋势。（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